

当上海的中产阶级生活幻想破灭，人们牺牲自由换到了什么？ “躺平”不是中国的选择

作者:荣筱菁

当今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很多方面有精神共通之处。它们都经历了经济上的飞跃和政治上的极权，都痛恨“美帝”，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民族复兴大业，把民族主义情绪和控制言论、打压异己当作实现大业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报记者萨布丽娜·塔弗尼斯2015年最后一次到访俄罗斯时，面对着眼前美丽繁荣的莫斯科发出的疑问，大概也适用于中国——“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在上海封城带来的民生危机中，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格外适时。

上海人经历的痛，单看社交媒体就能让人感同身受。一位老人向路人呼救、请求“哪个好心人帮我买点蛋”的视频让人百感交集；富裕阶层如“风投女王”徐新，也同样需要为了采买食物请人把她拉进微信面包团购群；而经济学家郎咸平年近百岁的母亲也因为等健康码耽误了救治而不幸辞世；方舱里的一些自闭症孩子只能靠注射镇静剂维持情绪稳定；一些隔离者则遭遇了暴风雨后临时板房里漏水停电。在严厉的封锁中，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似乎都在体验着同样的焦虑。很多镜头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反复问我，这些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它们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更艰难的是那些需要继续治疗的尿毒症和癌症患者，他们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甚至连最基本的止痛药都已经耗尽，在难以想象的疼痛中煎熬。因急病或重症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人已经成为一座座无声的墓碑，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间记录能在网络生存多久，毕竟，一篇篇记录求救信息和表达不满的网帖和文章已经埋葬在404网络坟场里——人们没有抗议的自由，但强大的审查机器有删帖的自由。

如果没有出现极端情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对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来说，或许“自由”这个词很久都不会再被提及，中国居民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由于在疫情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防控得力，民众毕竟有正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但在威权国家，极端情况往往会随时随地从天而降。

对于之前曾经沉醉于莫斯科繁荣景象、放弃了抗争而转为从小事着手建设国家的俄罗斯自由派来说，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无异于当头一棒。时报的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说，“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

而在一直以富庶繁华著称的上海，对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享受着“稻米流脂粟米白”这种太平盛世小日子的中产阶级来说，封城之后的种种乱象又意

味着什么呢？也不止是上海，时报科技专栏作家袁莉在其“新新世界”专栏写道，据经济学家估计，自从奥密戎开始蔓延，全中国45个城市处于封城或半封城状态，受影响人口达到3.73亿。她将现在的“清零运动”与毛时代的“打麻雀”运动进行对比，指出像当年全国动员打麻雀间接导致农业歉收一样，中国的严苛抗疫政策也可能让所有人都遭殃。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对时报说：“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在中国，仍然支持“动态清零”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当人们突然陷入吃了上顿没下顿、急病无法就医、随时可能被拉去方舱隔离的境况，意识到自己之前依赖的岁月静好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自己毫无发声抗议或走出家门的可能性，他们也许会想一想，长久以来自己牺牲了种种自由，难道只能换回这样的结局？

读者来鸿：

在外人看来，中国人在没饭吃的情况下还支持清零政策显得匪夷所思。如果你也对此感到困惑，不妨听听来自封城漩涡中心的读者的声音吧。上海读者 Benjian Liu 在来信中从体制上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信中写道：“多数中国人最终忍耐政府的‘清零’政策，是因为看不到存在任何其他社会主体提出并有能力实现另一套行动方案的可能。司法独立的缺失则意味着压根不存在各方展开博弈的法理平台。于是，这套模式还在看上去不合理而又眼睁睁地延续、轰隆隆运转着。繁育公民社会与建立司法独立的紧迫性在疫情之下暴露得一览无遗。”

署名“Fox a free guy from CN”的读者在来信中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他说，在疫情之初，因为集权体制和百姓的顺从，中国的清零政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可否认那时候，集权专制制度的‘优势’得到了短暂体现。”但随着病毒破坏力减弱，中国政府却未能与时俱进，仍然采取最初的严苛抗疫方式，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这样的抗疫运动中，“渐渐出现了‘集体无意识’，出现了各种藐视社会秩序与法律的行为，如‘正常居民不做核酸检测也不允许出小区’、‘随便封楼封小区’、‘强行检查汽车后备箱’等违法侵权行为”。而同时“政府发布了诸多标语和



地震

暴风雨



外星人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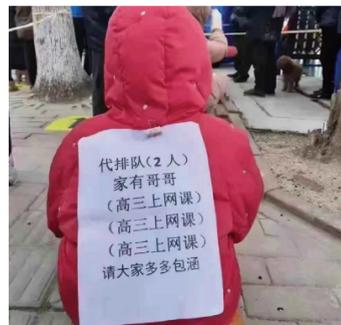
居委发菜了



问：五一能出去玩吗？
答：怎么就想到问这么花里胡哨的问题的，现在大家的活动范围仅限房产证面积，连公摊面积都涉及不到😞😞😞

(摘自新闻简报 海外华人礼记)

“动态清零” 人民只能靠网络段子苦中作乐



因封城而困在家中的上海民众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一位高级卫生官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尽管有报道称，因日常生活的停摆而导致食品短缺、难以获得医疗服务，但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官员梁万年周日表示，封锁是确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最佳方式。在该国的清零战略下，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十几个城市处于全面或部分封锁状态，以应对奥密戎新冠病毒病例的激增。封锁暴露了该战略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世界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已经放弃了这一战略。其他国家已经取消了大部分限制措施，但“躺平不是中国的选择”，梁万年说，他说的“躺平”指的是面对挑战时的松懈现象。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以及用于治疗重症的医疗资源有限，这让官员们仍然担心，所以无法放松对大流行的限制措施。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约有2.64亿，其中约4000万人未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梁万年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群体的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周一，中国卫生当局报告了27419例新增本地病例，绝大部分在拥有2600万人口的上海。与许多国家相比，这样的新增病例数并不算多，但最近由奥密戎变体推动的病例激增是中国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疫情。

自从这波疫情上月暴发以来，中国已报告了超过20万例上海本地传播的新冠病毒病例，其中大多数是轻度或无症状。该市目前仅一例重症；官员说，该病例需要住院治疗，但没有详细说明。在目前这波疫情中没有报告死亡病例。

大规模检测是中国消除感染战略的关键部分，它使卫生当局能够隔离检测呈阳性的患者，并迅速将他们送往医院或隔离设施。中国南方城市广州上周表示，在过去七天报告了少量本地传播病例后（不到50例），将对全市1800万民众进行检测。上周末，上海官员宣布对该市2500万居民进行第二轮大规模检测。

在新冠病毒首次出现的武汉市，官方周一开始要求地铁乘客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根据武汉地铁周一在网上发布的通知，乘客必须出示检测结果并扫描他们所乘坐车厢的二维码，以便当局跟踪病毒暴露情况。

尽管梁万年表示中国不会放弃其新冠病毒战略，上海当局似乎对公众对该市疫情处理的强烈抗议做出了回应。副市长周六表示，连续14天没有新病例的社区将解除封锁。周一，该市宣布启用新的划分系统，根据每个区域上报的阳性病例数对区域进行分类。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些举措对于缓解封锁造成的更大的经济影响起不到多少作用。投资公司Loomis Sayles的中国分析师庄博（音）说：“封锁的程度比人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

庄博说，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每次疫情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处于封锁状态，经济损失是可控的。但他估计，这些天来，相当于中国经济产出的四分之一左右被暂停。

“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因为奥密戎，几个省份被封锁，”庄博说。“这在今后将是一个风险。”

另一个风险是，人们因日常生活打乱而不断积累的失望情绪。周一早上，武汉数百万人得知该市地铁系统在一夜之间实施了新规定，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

“武汉自两年前解封以来，发出最严的防控信号，”作家兼商人翟海潮在微博上写道。“疫情没完没了，让人头疼。”

(摘自新闻简报 海外华人礼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